

自然、语言、文化与翻译

韩卓君, 樊林洲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自然现象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基础, 语言象征文化现实, 自然和文化的关系受语言束缚, 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各种复杂的关系。翻译研究试图解决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文化和翻译互补, 翻译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 可以协调或沟通不同文化传统。翻译学科的中介功能使我们在不同文化知识之间建立联系。因此, 翻译的目的就是探索两种文化之间的“辩证共鸣”关系。

[关键词] 语言符号; 任意性;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文化与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 (2018) 03-0098-03

一、自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人类用于表达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感知的工具。不同民族对同一自然现象有不同的假设和经验。译者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并理解这些差异, 翻译过程便会困难重重, 甚至出现错译, 如: 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 英语本意为: “It is useless to take precautions after something has happened that could have been foreseen and guarded against”, 含义是“事后弥补, 为时已晚”, 并非汉语的“亡羊补牢”之义。又如: A miss is as good as a mile, 英语意为: “差错就是差错, 大错小错都是错”, 而不是汉语的“失之毫厘, 谬以千里”之义。

自然和文化的关系受语言束缚。特定语言群体使用特定的语言, 该语言又约束该群体成员的思想。成员在表达自然现象时, 如果不使用其所在的话语群体在历史中形成的语言, 则无从下手。例如: “He plays ducks and drakes with his money”, 意为“他大量花钱, 尽情享受”。翻译过程中对文化现象的处理反映出语言对不同文化背景译者的约束。

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语言是人类经验的结晶, 是人类进行社会实践的手段之一。语言表达交际现实、观念和事件, 是人类关于现实共有知识的总集; 语言反映人的态度、观点和信念, 语言表达文化现实; 语言不仅可以用于

于表达经验, 还可以用于创造经验, 语言革新文化现实; 语言是具有文化价值、反映社会特征的符号体系, 语言象征文化现实。

二、意义和符号、文化编码的关系

语言是一种符号, 符号表达意义的过程涉及两个因素: 能指和所指(名与实)。能指本身不是符号, 只有把能指看作符号, 并把能指和所指联系起来, 能指才是符号。因此, 符号既不是词本身, 也不是能指所指的物体, 而是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 因为在能指所指之间没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能指所指之间没有完整的适应关系, 语言符号的这种二元论被称为非对称性。对语言符号的理解涉及两个方向: 语言表达的内容或指代的事物是编码符号, 属于语义学范畴; 语言通过语境表示信息是交际行为, 属于语用学范畴。

符号如何表达意义? 词的意义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 词有指示意义, 即其词典意义(本义或命名意义); 另一方面, 词还有联想意义, 如“玫瑰”在读者的心中会引起爱情、激情、美丽等联想, 这是词的内涵意义。词的文化特点在其指示意义和内涵意义上都有体现, 但在语际翻译中, 内涵意义上的文化特点常常会给译者带来更多困难, 因为文化意义是在语言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 不同民族历史背景不同, 呈现不同的文化拓扑结构, 存在文化上的不可通约性。例

[收稿日期] 2018-03-14

[作者简介] 韩卓君,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文化和翻译的互补与共生、翻译中的语境; 樊林洲, 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研究方向: 进化语言学、文化和翻译的互补与共生。

如,拟声词、节奏、叠词是语言任意性的表现,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所表达的瑰丽变化奇景和雄伟意境,译者想要翻译出来就有一定的难度。

符号形式体现特定话语群体成员的特定编码方式。不同符号表示把现实分类的不同方法,同一语言中的文化编码随时间而改变。文化编码是把文化信息放入个体和社会成员记忆中的过程。在文化编码中,译者把源语文化意象,用语义体系(概念、命题等)、语法体系(词、短语、句子等)和音系体系(音节、音位等)转换成目的语的语言形式,同时尽可能保存源语文化意象。经验编码在不同语言符号中所引起的文化联想意义不同,即使在同一个语言社会的不同话语社区,语义价值也不尽相同。不同语言的编码本身存在差异,不同语言群体给这些编码赋予的意义互不相同。语言编码的语义含义能反映特定语言群体看待自身和世界,即看待文化的方式,这种方式和该社会群体的经验、情感和思维有密切联系。这些经验、情感和思维是群体理解世界、和世界相互作用的愿望的非任意性表达。《红楼梦》的翻译对文化现象的处理就反映出不同群体看待文化的不同方式。例如:大观园:(杨译):the Grand View Garden,(霍译):Prospect Garden,两种译文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对时间的不同看法;怡红园:(杨译):Happy Red and Delightful Green,(霍译):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两种译文反映出东西方文化对颜色的不同看法。

文化编码体现在语言表达的文化内涵上。文化解码是理解词、短语或句子本义和文化意义的过程。在对语句进行文化意义解码时,译者要把包含文化的语句储存在短期记忆中,通过分析,辨认出潜在的命题意义、言外之意和文化意义,然后用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翻译过程的文化解码可概括为对源语文化解码,再用目的语符号编码的过程。

三、符号的特性

符号具有任意性。符号和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具有任意性。正是这种任意性使符号深深根植于某一话语群体文化中,由该社会成员使用。社会成员在其生活环境中无意识、不加考虑地运用这些符号。语言的本族语使用者并不认为其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他们把语言符号看作表达自然的一种必要工具。只有不含个人偏见的研究者和非本族语使用者,才会把符号看作偶然的、任意的。

符号在长期使用中被自然化。长期的使用让语言符号从其最初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脱离出来,失去其命题意义,直接作为符号使用,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例如,像“民主”“自由”等词由政客和外交官使用,则可能失去了其指称意义,甚至失去了其丰富的内涵意义,仅仅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和政治口号,像“Industrial Revolution”“holocaust”等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将最初历史事件指代的意义简化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不但影响符号使用者的记忆,而且给这些符号赋予想象中的重要性和正确性,这是不同文化对符号施加的文化意义。不同文化给符号施加的文化含义不同,在语际翻译中,译者要格外重视这一点。

符号使用者的交际活动产生语言行为。人类在解释事件时,通常以其个人经验和实际感知为依据,因此语言和翻译行为发生在交际和文化的背景下。文化固定形象或特征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文化感知。特定社会成员对其他人类社会特点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所属文化决定,文化典型模式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译者在翻译时要利用话语群体成员在其共有的生活历史和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期待心理,以这种期待心理为导向,通过语境线索,在译文中确定合适的意义。这些语境线索以文化理解为基础,形成译者得出特定结论的依据。译者通过对语义和文化的理解来维持语言的一致性,例如:All the colleges are scrambling for redshirts. 可译为“美国各大高校争抢那些在体育方面有特长的学生”。He is a valuable acquisition to the team. 可译为“他是该球队不可多得的新球员”,通过语境和文化线索,redshirts 和 acquisition 的准确意义得以表达。

四、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翻译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和交际是两种各不相同但相互联系的概念,文化通过交际习得、体现和传递,而在文化交流中,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翻译本身就是用一种语言符号对另一种语言符号进行解释的活动,是人类话语中的一种特殊交际和感知过程。可译性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文化在翻译活动中得以体现,只有将新文本包含在文化中,人们才能感知文化的特征和存在,从而进行文化革新。在翻译文化转向研究中,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一方面,翻译界越来越重视翻译文本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在接受文化特征方面。韦努蒂把翻译特征形成能力称为翻译参与能力,这种能力既能保证文化的凝聚力和异质性,又能使文化按其独特方式发展,还能促使文化进行自身更新^[1](P68)]。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开始重视文化特征这一概念,人们已达成一种共识,社会若要表现特定特征,必须重视其文化特征。要充分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首先要理解其文化特征,这也被称为文化转向,赛格尔斯(Segers)^{[2](P384-385)}指出:

在构筑特定社会特征方面,文化特征是决定因素,这就是文化转向。这同时意味着,在当代,不仅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而且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无论其具有全球性还是地区性特点,只有通过文化特征这一概念才能理解。

但是,目前尚未有一个基本概括性理论能把文化研究全面系统地整合起来,文化研究者对文化的定义纷繁复杂,因此文化系统理论难以形成。“尽管在一个世纪里人们努力定义文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关于文化本质在社会人类学家中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3](P16)}。不过,在翻译研究领域,学科目标的定义范围就相对狭窄一些。如果把翻译领域和文化领域进行比较,并且把翻译研究置于文化研究之上,定义学科目标就会容易许多。尽管翻译研究的文化问题范围较小,但翻译研究试图解决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文化和翻译互补,翻译也是一种解释文化机制的活动。

翻译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可以协调或沟通不同文化传统。翻译由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望支配,译者为了译出适合目的语文化的译本,就把源语文化看作是可以完全理解的。译者在理解源文本和吸收文化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则被视为文化转换的限度。出于对文化差异的尊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差异上,但译者若试图超越文化差异,把各种文化传播到全世界,并非易事。

翻译提供了对待文化差异的方法。译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差异上,用尽可能令人满意的方法解决文化差异,提高文化翻译的限度。翻译研究领域理论成果的迅速发展让我们对文化差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因此,翻译有助于我们把语言、语言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翻译实践中。翻译学科的中介功能使我们能够整合不同文化、不同学科、不同视角下的学习经验和方法论。

翻译还能提高译者的文化能力(cultural literacy)。文化能力这一概念由罗素·伯尔曼(Russell Berman)提出,他认为文化能力对翻译

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文化能力可以使译者意识到学习另外一种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伯尔曼具体说道:“翻译过程中的‘思考’,我指的是超越对相异文化的热情想象,以知识为基础,达到一种理解文化的能力。这个术语的另外一个含义是学习另外一种文化的人必须具有自我思考的能力。学习文化的目的不是要达到像学习母语那样所达到的终生掌握的程度和理解的水平,而是要探索两种文化之间的辩证共鸣关系。”^{[4](P61)}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对比不同文化,理解文化差异,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把文本从一种文化置换成另一种文化,从而实现两种文化间的“辩证共鸣”。

五、结语

20世纪后期形成的翻译研究学科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使翻译具有自身的特点,强化了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共生联系,使翻译成为一门真正的交叉学科。在不同语言的翻译中所体现出的异质文化的互补、互证、互识,不但决定着跨文化传播的质量,而且使译作本身也形成独特的文学体系或其他内容体系,这也是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 考 文 献]

- [1]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 London: Routledge, 1998.
- [2] Segers, Rien T. The cultural turn: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cept “cultural identity” [A]. In: Geest, D. de; Graef, O. de; Delabastita, D.; Geldof, K.; Ghesquiere, R.; Lamber, J. (eds.). *Under Construction: Links for the Site of Literary Theory (Essays in Honour of Hendrik van Gorp)*.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 Katan, David.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4] “Foreign Cultural Literacy: Language Learning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Languages Across the Curriculum: Interdisciplinary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ized Education*, ed. Maria - Regina Kecht and Katharina von Hammerstein. (Ohio State University Foreign Language Publication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s Resource Center) 2000.

[责任编辑 薄 刚]